

战后七十年日本神道的历史变迁

赵刚

【内容摘要】 作为研究日本战后社会宗教信仰变化的一部分，本论以战后70年为历史轴线，围绕日本神道宗教在走下战前国家神道体制祭坛后的历史变迁，分析神道在战后日本宗教以及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历史地位、影响以及神道本身所发生的变化。为完成上述研究目的，本文以国家神道、靖国神社、教派神道为主题，对上述三个研究对象在战后70年间各自所发生的变化、神道的现状以及实际影响力在进行客观分析的基础上加以综合阐述。着重围绕日本战后在GHQ指令的督导下被迫实施政教分离国策后，神道宗教在日本社会选择国家政体、重新确定价值取向、右翼保守历史观的形成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探讨战后教派神道本身发生的变化对传统文化所带来的冲击，并且就神道宗教对当代日本人行为意识以及宗教信仰的影响进行分析。

【关键词】 国家神道 国体 靖国神社 教派神道 新兴宗教

【中图分类号】 D693.739 【文章编号】 1003-4048(2015)03-0069-76

【文献标识码】 A 【DOI】 10.16496/j.cnki.rbyj.2015.03.010

【作者简介】 赵刚，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副研究员（北京 100007）。

1945年在日本历史上是一个具有特别意义的年份。一方面，这一年的8月15日，日本政府由天皇出面，以“御音放送”的形式宣布向盟军方面无条件投降，这一举动代表着近代日本军国主义的彻底失败。另一方面，这一年的12月15日，盟军司令部向日本政府下达了名为《关于废除日本政府对于国家神道、神社神道的保障、支援、保全、监督及其宣传的文件》（GHQ神道指令）。该指令使日本第一次在历史上实现了政教分离，使日本延续千百年来的宗教体制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一、国家神道在战后的变迁

1945年到1955年的十年是日本从战败的废墟中复苏并重新走向复兴的重要时期。对于战前处于思想统治地位的神道而言，更是摆脱存亡危机、重新回归日本宗教社会的重要阶段。本节旨在解析在战前国家神道体制中占主导地位的神社神

道如何完成“维护国体”转型成为一般宗教的过程。

（一）颠覆战前“国体”的四个文件

迫使战后国家神道发生根本性变化的有四个文件，分别是GHQ签发的《神道指令》、昭和天皇的《人间宣言》、日本政府签发的《宗教法人令》以及战后的《日本国宪法》。

1.《神道指令》——在精神上解除了日本军国主义的武装

1945年，日本在制度上发生了两个根本性质的变化。其一，军国主义分子把持的内阁彻底垮台，根据战后重新修订的宪法，天皇成为日本的象征、军部被彻底废除、国会议员民选、实施内阁负责制，上述制度使日本实现了民主治国。其二，在日本历史上第一次实现了政教分离，使日本民众摆脱了思想的束缚，实现了宗教信仰的自由。

如果说前者的内阁负责制是从制度上保障了

日本的民主化。“政教分离”，让国家神道走下高高在上的神坛，则是从精神上使日本人脱离了战前“皇权神化”思想，对铲除军国主义思想根基，解放民众的思想，使日本在战后成功地转型成为现代资本主义国家，具有重大的意义。

自1945年8月日本投降至1952年4月日本签订《旧金山和约》为止的七年，日本接受联合国军最高司令部（GHQ）所属的远东委员会的管制。该委员会根据《波斯坦公告》第十条：“日本政府必将阻止日本人民民主趋势之复兴及增强之所有障碍予以消除，言论、宗教及思想自由以及对于基本人权之重视必须成立”的规定，针对战前具备国家意识形态地位的国家神道体制进行了大刀阔斧式的改革。是年10月4日GHQ发布了《废除对政治、民权及信教自由的限制指令》（即《人权指令》）。根据该命令，战前实施的《治安维持法》、《宗教团体法》等旧法令、敕令被全部废除，特高警察等国家暴力组织被解散，战争期间被拘捕的反战反政府人士被无条件释放。同年12月15日GHQ又发布了《关于废除日本政府对于国家神道、神社神道的保障、支援、保全、监督及其宣传的文件》（即《神道指令》）。《神道指令》的主要内容可以归结为以下三条：1、停止政府以及公职人员对于神道以及神社的援助。2、即刻停止神道教义和祭祀中对国家主义和军国主义的宣传。3、官方文件中禁止使用“八纮一宇”等词语，废止基于神道传统宣扬天皇门第、血统高于其他国家元首，日本以及日本国民优越于其他国家的思想。上述规定，对于战后日本的宗教、思想、教育等领域给予了极大的影响。

《神道指令》历史意义又可以归结为以下三条：1、宣布政教分离，杜绝宗教成为军国主义诱迫民众参与侵略战争的工具。2、迫使神社神道脱离国家权力，使战前凌驾于佛教等其他宗教的神道回归于与其他宗教平等的地位。3、奠定了战后日本宗教的基础。因此对于盟军方面而言，《神道指令》不啻于在精神上解散了日本军国主义分子的武装。

对于在战前位处上层建筑的神社方面来说，GHQ的《神道指令》无疑具有毁灭性的杀伤力。日本战败后，神社在日本社会中的地位落差，如

同谷省吾在其所著《神道原论》中所述：“神道与国家是不可分的，神道是与国家同命运共发展的产物。天皇通过年中的祭祀行使王权……《神道指令》将上述传统与理念全部葬送了”^[1]。同时根据GHQ的命令以及1947年1月颁布的新《皇室典范》，天皇在宫中的祭祀行为只作为天皇个人的宗教行为，不再是国事行为，更使神道与国家权力进行了切割。

2.《人间宣言》——否定了千百年来天皇的神性

为了从根本上消除国家神道对民众的影响，1946年元旦，昭和天皇在盟军司令部的授意下发布了《关于建设新日本的诏书》^[2]（即《人间宣言》）。日本从有历史记载开始，原则上没有经历过王朝的更替，天皇家族作为万世一系“现人神”统治日本，具有不容置疑的神圣地位和合法性。然而昭和天皇在1946年元旦被各大报刊转引的《人间宣言》中称：“朕与尔等国民同在，利害与共、休戚相关。朕与尔等国民的纽带是依据互相信赖互相敬爱而成，并非是单纯依据神话传说，亦非依据天皇为“现人神”、日本民族优越于其他民族进而拥有能统治世界的使命的空洞概念”^[3]，以婉转的语气明确否认了自己作为“现人神”的身份。该宣言在取消天皇统治日本神权的同时，也否定了国家神道在日本的特殊地位，在日本近代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3.《日本国宪法》——从法律层面上宣告了国家神道的终焉

1946年11月3日，日本国会公布了新的《日本国宪法》。“主权在民”、“对基本人权的尊重”、“和平主义”这三条是新宪法的基本要素。新宪法里与宗教直接有关的规定主要有三项。宪法第一条规定：“天皇是日本的象征，是日本国民整体的象征，其地位，以主权所属的全体国民的意志为依据”。该规定虽然确定保障了天皇制的延续，但是同时，天皇作为日本的“象征”而失去了“现人神”的地位。第二十条规定：“对任何人的信教自由都给予保障，任何宗教团都不得从国家接受特权或行使政治上的权利（中略）国家及其机关都不得进行宗教教育以及其他任何宗教活动”。非常明显，这一条是专门针对神道而制定的，因为

在战前只有神道享受到国家的特殊关照并具有特殊的地位。第八十九条规定：“公款以及其他国家财产不得作为宗教组织或团体的使用，也不得为其提供方便和维持”。根据战前的社格制度，神社中的大小官社（官币、国币）都由国家以及地方政府提供经费，伊势神宫的神官同时还是国家的官吏。而上述规定则从法律上剥夺了神道的特权，使神道成为了一个普通的宗教团体。

4.《宗教法人令》——迫使神道由国家神道重新回归到了宗教的范畴

日本直至1939年出台《宗教团体法》为止没有宗教法人一说。为了保证国家神道的特殊地位，强化对民众思想的控制，当时的政府在教团的设施规模和信者的人数上有着相当严格的要求。1945年12月28日《宗教团体法》被废止后《宗教法人令》随即出台，《宗教团体法》是基于对宗教团体严格控制的认可制度。《宗教法人令》只是就成立新的宗教组织的条件制定了一些规则。任何人只要按照规定将欲成立的宗教团体的成立目的、所在地、财务规则、管理制度等填写申报后就可以获准成为宗教法人，无需官方的认可，也不用向地方政府报批。如果说《神道指令》使神社面临了被废除的危机，《宗教法人令》则是为神道起死回生提供了绝好的机遇。该条例出台后，各种宗教团体纷纷成立；面临存亡危机的神社界也以皇典讲究所、大日本神祇会、神宫奉斋会三个团体为中心，于1946年2月成立了宗教法人神社本厅。神社本厅实际上承担了被GHQ已被废除的原属内务省管辖的神祇院的职责，也是日本目前最大的神社团体，在各个地方的神社厅及其支部是其下属机构。

（二）神社本厅的再建与“维护国体”

1. “国体”与神道的唇齿关系

战后日本，对于统治阶层而言“维护国体”是第一要务，根据高桥纮的调查，1944年当战局明显已经不利于日本时，近卫内阁就曾经考虑过让昭和天皇让位于皇太子明仁^[4]，为的就是保证天皇制在日本的延续。1945年昭和天皇在给明仁皇太子的信件中也提到“如果继续进行战争，三种神器将不能保”^[5]。而“御音放送”中最后一段“朕于兹得以维护国体，信倚尔等忠良臣民之赤

诚，并常与尔等臣民同在。若夫为情所激，妄滋事端，或者同胞互相排挤，扰乱时局；因而迷误大道，失信义于世界，此朕所深戒。宜举国一致，子孙相传，确信神州之不灭。念任重而道远，倾全力于将来之建设，笃守道义，坚定志操，誓必发扬国体之精华，不致落后于世界之进化，望尔等臣民善体朕意”^[6]，两次提到了“国体”。

这里所指的“国体”就是万世一系的天皇制，而天皇制则是建立于神道的基础上的。因此《神道指令》所规定的政教分离对神道来说就如谷省吾在《神道原理》中说的那样：“《神道指令》不只是打破了明治以来成立的神道体制，打破的是自日本成立国家以来神道的存在方式，换而言之也就是从根本上颠覆了日本立国精神的根基”^[7]，是致命性的打击。

2. 神社本厅与战后神社的复兴

脱离了国家神道光环的大小神社在战后失去了国家的保护，但是它们很快又重新集结在神社本厅的旗下，重新开始了战后的宗教活动。

毫无疑问，神社本厅是战后日本神道最具代表意义的机构。1946年2月3日，内务省神祇院被解散的第二天神社本厅就在东京诞生。似乎一切都像是计划好的一样，构成神社本厅的大日本神祇会、神宫奉斋会、皇典讲究会三团体，根据《神道指令》在1月26日被解散，但是他们的财产全部被“安全”地移交给了新成立的神社本厅。

至明治维新为止，神道的神职人员一般都是世袭。但是，明治维新后政府废除了世袭，在政府内设置内务省神社局管辖全国神社。战后根据政教分离的原则，神职人员不再是国家公务员，但是，神社本厅的管理体系跟战前没有什么原则性的差别。作为管理全国神社的最高机关，神社本厅下辖个都道府县46个神社厅，新修的《神社本厅规程类集》里明确规定：“尊神宫为本宗，努力维护道统”^[8]。另根据各年度文化厅的《宗教年鉴》可知97%以上的神社归属于神社本厅管辖。从这个方面而言，战后的神社格局依旧维持了以伊势神宫为中心神社神道的体系。

3. 一纸空文的政教分离原则

虽然在战后很长一段时间内，日本严格执行了政教分离的原则，但是伴随冷战的开始，神道

与政治又重开了千丝万缕的关系。1969年结成的神道政治联盟无疑就是神道在政界的代言人。神道政治联盟的总部设在东京，几乎所有的神社本厅关联的神社都是它的会员。

神社所具有的组织能力，有利于集中选票，因此神道政治联盟成员当选的人数逐年增加。从1980年的3名参议院议员开始起步，至2014年12月止，现在已经一共拥有298名议员，而现任会长又是现职的内阁总理大臣安倍晋三。神道政治联盟主要目标如下：1、建立珍惜皇室以及日本传统文化的社会。2、根据日本的历史和国情制定新宪法。3、确保为日本而牺牲的靖国神社的英灵享受应有的国家礼仪。4、寻求能培养出对日本的未来充满希望的儿童的教育制度。5、寻求日本成为被世界所尊重能为世界做出贡献的国家^[9]。迄今为止该组织已经成功主导制定了元号制度、昭和之日以及《国旗国歌法》。而对于靖国神社以及甲级战犯等历史问题，神道政治联盟始终持保守右翼的立场，大力推进总理大臣以官方身份正式参拜靖国神社。同时该联盟还拥有《神政联通讯》等宣传杂志，目前在推动修宪方面的活动非常积极。

二、靖国神社问题是验证日本战后历史认识的一面镜子

受1945年GHQ《神道指令》冲击最大的首先应该是靖国神社。这座创建于1869年，以战歿者招魂为祭祀目的的神社，从一开始就与传统的神社具有不同的性质。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1）祭祀人数庞大、对象特殊、管辖神社众多。靖国神社祭祀的对象原则上限定于在死于战场的军人（含准军人）、军属，现在祭祀对象一共约有247万。战前根据政府命令设立的地方护国神社也都归靖国神社辖制。（2）特立独行，国家主义色彩浓重。靖国神社战前直属军部管理，与其他神社在战前统一归属内务省管辖不同的是靖国神社一直是军部下属的机构，即便在1940年“神祇官制度”成立以后，也一直独立于内务省神社局，而现在也是单独作为宗教法人而独立于神社本厅。（3）由于供奉A级战犯，战后无论在日本国内还是国际社会一直是争议的对象。

（一）靖国神社的“起死回生”与日本战后反省密切相关

跟其他神社一样，靖国神社在神道指令后脱离了国家权力的庇护，成为众多宗教法人中的一个。但是与其他神社不同的是，为了显示与其他神社的差异，靖国神社虽然跟神社本厅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但是不属于神社本厅的管辖。

对于靖国神社的存在，日本国内外都有着激烈的争议。基于靖国神社在战争期间曾经起到培植忠君思想及其鼓励侵略的作用，战后GHQ方面曾经考虑过拆除该神社。其后因为各种原因，靖国神社被保留了下来，1946年9月经过重新登记，靖国神社成为宗教法人。但是直至朝鲜战争开始，GHQ在诸如土地资产所有权等多方面对靖国神社进行了制约。以至于靖国神社方面曾经面临非常严峻的经济困难。

1951年9月8日，日本与西方各国签订了《旧金山对日和平条约》，随后的10月18日，当时的首相吉田茂率领参众两院议长和阁僚前往成为宗教法人后的靖国神社，参加了战后由该神社组织的首次例大祭（神社年度中最为重要的祭祀活动，通常为一两次）。靖国神社也从国家重新得到了原有的土地。

（二）甲级战犯的合祭，政府方面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靖国神社真正摆脱危机是在日本政府为战犯松绑之后。1952年5月日本政府发通知恢复了战犯的公民权，1953年又宣布将战犯的死亡认定为“法务死”（准公务死）。在这样的背景下，从1956年至1971年靖国神社方面在厚生省的帮助下开始了大规模合祭仪式。具体流程如下：1、靖国神社向厚生省咨询战死者名单。2、厚生省将名单转发给地方自治体要求他们配合调查。3、厚生省将地方政府提供的名单转交给靖国神社。4、靖国神社判断是否拥有合祭资格^[10]。其间在1959年3月被远东军事法庭判处乙、丙级战犯的名单也被送到了靖国神社，在当时宫司筑波藤磨的许可下，至1967年10月为止前后共计984人的名单被悄然合祭到了靖国神社。同时，12名甲级战犯的名单（当时不含松冈洋右和永野修身）也早在1966年2月也经由厚生省援护局送到了靖国神社方面。然

而当时的宫司担心会引起社会舆论的反弹，一直没有答应。直至1978年筑波去世，甲级战犯未能被合祭。

将甲级战犯合祭入靖国神社的是筑波的后任松平永芳。松平永芳本身曾经是海军佐官，同年10月7日就任三个月就将14名甲级战犯进行了秘密合祭。甲级战犯合祭的消息传出以后，在日本社会产生了很大的波动。根据《日本经济新闻》所载前宫内厅长官富田朝彦的遗物笔记中可以得知昭和天皇也对此表述了不满，原话如下：“靖国神社的筑波宫司处理合祀问题很慎重，但是换上松平庆民宫内大臣长子松平永芳担任宫司之后，他完全不了解他父亲爱好和平的想法，随即决定合祀，所以从那之后就不再去靖国参拜，那是我的信念”^[11]。事实上，在战前昭和天皇曾经18次参拜靖国神社，在战后至1978年也曾经参拜8次。

筑波藤磨时代未能将甲级战犯合祭入靖国神社是有它的历史背景的。当时日本以及国际社会对日本过去的侵略战争以及甲级战犯的依然非常憎恶，如果靖国神社冒然将他们进行合祭，除了会给靖国神社本身带来麻烦，同时也会殃及到昭和天皇本身。

（三）靖国神社今后面临的主要问题

在执政的自民党方面，由于其创始成员本身以及后援团体就很多是来自于旧军人官僚，自1955年体制成立以来一直对靖国神社关照有加。使靖国神社重新成为国家管理的机构，曾经是自民党的政治目标。1956年，自民党就制定了《靖国神社法草案纲要》。1967年6月又以自民党遗族议员协议会的名义提出了《靖国神社法案》。该法案自1969年6月至1974年6月曾经六次向国会提交审议，1974年甚至还在众议院得到了批准。但是，该法案最终还是因为没有得到大多数国民的赞成而成了废案。

由于靖国神社从诞生之日就具有其特殊性质。直至今日作为一介宗教法人也仍然触及很多敏感问题。主要可归纳如下：

（1）政教分离的原则

靖国神社作为宗教设施，在信仰自由的日本任何人都都有权利去参拜。但是从它祭祀对象的特

殊性（包含甲乙丙级战犯）的角度来考虑，具有公职身份的政治家本不应该前往参拜。但是，从1951年到2013年为止为数众多的首相以及大小官僚曾经以或公、或私的身份参拜过该神社。从司法的角度，针对小泉纯一郎元首相参拜靖国神社。大阪高等法院和福冈地方法院曾经分别做出过：“违宪”的判决。

（2）历史认识问题

对于由日本军国主义分子挑起的太平洋战争以及近代一系列侵略战争，靖国神社的历史观可以从其附属的“游就馆”（战争纪念馆）以大量物件以及记录片对其赞美和褒扬的态度可以得知。但是，这恰恰违背了历届日本政府对于过去侵略历史的正式表态，也违背了战后日本社会谋求和平的客观事实。

（3）战犯的合祭问题

战犯合祭的问题，伤害到周边国家，特别是中韩两个曾经在近代历史上饱受日本军国主义之害的国家人民的感情。在日本国内也同样有强烈的反对声音，也正因为如此甲级战犯才会在战后三十多年后才被偷偷摸摸合祭。同时，合祭行为本身如果没有厚生省的配合是不可能成立的。政府机构对特定宗教法人给予这样的特殊待遇，本身就是缺乏合理性的，也正因为意识到这一点，厚生省才会在1971年2月向各都道府县发出了名为《废除1956-70年邀请协助合祭的通知》的通知^[12]。

战后七十年的今日，由于上述问题依然没有得到解决，靖国神社依然在日本国内以及国际社会存在很大的争议。

三、战后神道几个新的发展趋势

（一）战后教派神道以及新兴宗教的发展

江户末期和明治维新以后，在民间以传统的神道信仰为基础，吸收复古神道等神学理论，陆续形成若干神道信仰团体。其中影响较大的有13派，分别是神道大教、黑住教、神道修成派、出云大社教、扶桑教、实行教、神道大成教、神习教、御岳教、神理教、禊教、金光教、大本教/天理教（天理教退出、大本教加入）。上述各教派统称教派神道。这些教派虽然主要信奉神道教义，

但各派各有教祖、独立的教义和比较严密的宗教组织，而一般又不以某一神社为活动中心。村上重良对教派神道有如下分析：“教派神道的实际原本是幕末维新时期成立的习合神道、佛教、修验道、阴阳道等多种系统的民间宗教，（中略）政府将这些多元宗教作为神道的一部分进行合并，从根本上而言就是在国家神道的形成过程中，服从政治和制度的产物”^[13]。从村上的分析可以看出，教派神道就其性质而言，是来自于民间对自然崇拜，战前的政府人为地将它归纳到国家神道的系统里。

在战前，教派神道在国家神道的压制之下被迫成为国家神道的附庸以及灌输天皇神权思想的道具，具体来说就是教派神道的教义必须符合国家神道以及天皇神权国体的宗旨，只能作为推进国家神道的工具而存在。政府通过行政手段将神道分割为以祭祀为中心的神道以及以教化为中心的神道。前者为国家神道，而后者则成为了教派神道。凡与此方针有抵触的教派就会成为被取缔的对象。比如十三教派之一的金光教由于提倡“人无上下，皆为神的氏子”、“天皇亦为人”（《金光大神理解》第215节、第731节）不仅长期未能获得宣教的许可，而且教团的主要干部也被多次逮捕。同样，现在拥有180万信徒起源于教派神道的天理教，其创始人中山美枝曾经被18次逮捕入狱。

对于战后的神社界而言，有一个重要的特征就是战前受到军部压制的教派神道，摆脱了国家神道的束缚，利用战后民主制度得到了迅速的扩展。同时，战后的教派神道的另一个特征是，它在日本的影响力与战前相比有了很大的飞跃，而从这些教派中又陆续分离出许多新的神道团体。

教派神道拥有自己的组织——由12个教团组成的“教派神道联合会”，该组织成立于1934年。与战前不同的是，现在的教派神道联合会与神社本厅的关系是平等的宗教组织团体。现成员有出云大社教、大本教、御岳教、黒住教、金光教、实行教、神习教、神道修成派、神道大教、神理教、扶桑教、禊教共12个。该会每月11日召开一次理事会，采取一票否决制的形式组织、决定教团的活动内容，其主要的目的是推动神道教化。

表1 神道教派的信者·教师·教会数量一览

教团	信者	宣教师	设施
金光教	430021	3864	1528
御岳教	-	-	372
黒住教	297767	1586	316
出云大社教	1260623	8139	212
神理教	243648	1324	129
扶桑教	35500	407	124
神习教	164909	274	108
实行教	26360	334	96
神道大教	25208	548	84
神道修成派	12591	310	69
神道大成教	21327	185	28
禊教	87311	540	24

资料来源：[日]文化厅编：《宗教年鉴》2013年

从表1可以看出教派神道在战后获得了稳步的发展。主要有以下三个特点：1、在战前教派神道中属于孤立状态的教团得到了发展。特别是战前与国家神道保持一定距离、甚至有过对立的金光教、出云大社教、天理教在战后迅速发展并拥有了为数众多的信者。2、战前紧跟国家神道的教团发展缓慢。比如战前与国家神道有密切关联的神道大教、神道修成派、扶桑教、神道大成教等由于内部机制或是未能顺应时代出现了停滞。3、从教派神道中分离或分裂产生新的神道宗教组织。最为典型的是曾经是规模最大教派神道的天理教，1970年退出了神道教派联合会，自成系统，已经成为日本新兴教派之一。

（二）战后神道新新兴宗教团体的发展

如果将教派神道定义为新兴宗教团体，那么从教派神道中重新分离出来的则可被称为新新兴宗教团体。在神道里最为典型的新新宗教团体主要有三个：（1）生长之家。（2）世界救世教。（3）自由教团（PL教团）。是分别从大本教以及天理教分立出来的新兴宗教团体。

（1）生长之家：教祖谷口雅春，曾任大本教杂志《神灵界》编辑，从1929年开始出版《生长之家》（后改称《生命的实相》）杂志，吸收佛教、神道教、基督教以及西方哲学思想，创立教义和

教派，现有教徒 87 万，总部设于东京。

(2) 世界救世教：教祖冈田茂吉，曾任大本教支部长。后脱离大本教，另设大日本观音会，1952 年成为宗教法人，实施冈田式神灵压指疗法，进行传教医病，以净灵、自然农法、美术文化活动为中心，现有信徒 83 万，总部设于静冈县。政治上保守，是自民党的支持团体之一，有“MOA 国会议员联盟”。

(3) 自由教团 (PL 教团)：PL 是英语 Perfect Liberty 的缩写，意为完全自由。从天理教分立出来。创始者御木德一。御木在 1924 年自立人道德光教，后改称人道教团。认为唯一的神是天照大神，以天皇《教育敕语》为教典，要求信徒孝于父母，友于兄弟，夫妻和睦，勤于本业。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改称 PL 教团。第二代教主御木德近宣称神是使宇宙按一定秩序和法则运动的原动力，人是创造神之子，是神的一种表现。在社会关系方面，注重长幼有序之道、男女之道等道德说教。现有成员 200 万，主要对象是城市中的工商业者和公司职员。

新新兴宗教团体虽然传统上不如教派神道，但是在组织能力和规模实力丝毫不弱于前者。1951 年新新兴宗教团体成立了名为“新日本宗教团体联合会”的组织，现有成员 16 家。

战后日本新新兴宗教团体主要特点有三个：(1) 系统上源自于传统神道，对自然和神祇的观念非常强烈、以救世为其中心教义，发源地由农村转向了城市。(2) 教团的数量众多但是主要起源于教派神道的大本系、天理教系、世界救世教系。(3) 注重面向海外推广。比如 PL 教团在海外的教会已经超过了 260 个，分布南北美洲和欧洲。生长之家和世界救世教的分布也遍及各大洲，在韩国、新马泰等东南亚地区也有据点。

(三) 神道与文化的传承成为一种新常态

战后神社界最显著的变化之一是加强了文化方面与市民的交流。在人类发展历史上，宗教与文化一直是密切关联的。作为传统艺术的雅乐、能乐、净溜璃、歌舞伎与神道原本就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但是在战前国家神道占主流时期的神道，更多被用来宣扬和维护天皇的神权，民间的祭祀被搁置到了一边。

但是，从神道的原始理念考虑，自然界的山川、森林、星辰、风、火、雷、动物、祖先的灵等原本都是神道的祭祀崇拜的对象，因此才会有山神、水神、海神、田神、地神、雷神、太阳神等八百万神。战后神社通过对自然诸神的“祭”(MATURI) 将更多的民众聚集在了一起，由此也带动和促进了传统文化的复兴。同时，由于很多神社历史悠久，其建筑本身就是重要文物，在政府的帮助下很多神社成为国家指定的“重要文化财”，在资金上得到政府的支援。通过多年的磨合，目前原本许多带有浓厚宗教色彩的神社活动，现在已经以民众共同参与的形式赋予了神道新的形式，最为著名的有京都的祇园祭、葵祭、时代祭以及各个地方的“三大祭”。上述“祭”的变化从某种意义上而言对研究今后神道的走向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作为日本传统的信仰，神道在日本有着悠久的历史。无论是始于弥生时代的原始神道还是明治维新后成立的国家神道，神道都与日本社会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国家神道”的概念源于 GHQ 的《神道指令》。战前，国家神道伴随天皇的集权以及神化应运而生，以近代天皇专制国家体制为基础，国家神道成为了“维持国体”的工具。从 1906 年(明治 39 年)日本政府实施官国币社国库供进制度至 1945 年日本战败为止，将神社信仰脱离传统宗教而列于道德范畴、并将国家神道体系强加于民众是当时日本的基本国策。而遍布日本全国的神社则是实施神道教化，宣扬“国体”的第一现场。

战后，日本在 GHQ 颁布的《神道指令》的基础上，天皇发表了《人间宣言》，政府制定、颁布了《宗教法人令》和《日本国宪法》。前述四个文件从法律制度上颠覆了战前的“国体”。由此带来的结果是，以 1945 年为分水岭，神道走下了高高在上的国家祭坛，成为一介宗教法人，在形式上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但是，由于天皇制在美国的温存下得以保留，而神道与天皇制又有着无法切割的渊源关系，脱离了国家神道光环的大小神社在战后虽然失去了国家的保护，但是它们很快又重新集结在神社本厅的旗下，重新开始宗教活动，战后的神社格局

依旧维持了以伊势神宫为中心的神社神道体系。冷战格局下，神道与政治又重新开始了千丝万缕的关系。成立于1969年、现有298名国会议员的神道政治联盟，无疑已经成为神道在政界的代言人。

靖国神社作为国家神道体制下的产物，在战后今天的现实生活中无疑是最能体现当代神道体系的特征。战后七十年的今日，由于政教分离、历史认识、战犯合祭等问题，对于靖国神社在日本国内以及国际社会依然存在很大的争议。

同时，战后的日本神社界，也发生了一系列重要的变化。首先就是战前受到军部压制的教派神道，摆脱了国家神道的束缚，利用战后民主制度得到了迅速的扩展，其影响已经扩展到海外，不容忽视。其次，战后神社界以文化互动的形式加强了与市民的沟通。许多原本带有浓厚宗教色彩的神社祭祀仪式，现在转变成为具有浓厚地域文化特色的市民活动，诸如此类的民众共同参与，赋予了神道祭祀活动新的形式，值得进一步关注。

参考文献：

- [1]〔日〕谷省吾著. 神道原論 [M]. 伊勢：皇學館大学出版社，1971:3.
[2][3]〔日〕国会図書館ホームページ [OL]. [http://www.](http://www.ndl.go.jp/constitution/shiryō/03/056shoshi.html)

[ndl.go.jp/constitution/shiryō/03/056shoshi.html](http://www.ndl.go.jp/constitution/shiryō/03/056shoshi.html).

- [4]〔日〕高橋紘著. 象徴天皇 [M]. 東京：岩波新書，1987：11.
[5]〔日〕保阪正康. 裕仁天皇と明仁天皇 [M]. 東京：講談社，2009：18.
[6]〔日〕NHK ホームページ [OL]. http://cgi2.nhk.or.jp/shogenarchives/sp/movie.cgi?das_id=D0001410387_00000.
[7]〔日〕谷省吾著. 神道原論 [M]. 伊勢：皇學館大学出版社，1971：5.
[8]〔日〕神社本庁編. 神社本庁規程類集 [S]. 東京：神社本庁，1998：1.
[9]〔日〕神道政治連盟 [OL]. ホームページ：<http://www.sinseiren.org/shinseirentoha/shinseirentoha.htm>.
[10]〔日〕神社本庁編. 靖国神社 [R]. 東京：PHP研究所，2012.
[11]〔日〕日本經濟新聞 [N]. 2006-7-20.
[12]〔日〕国立国会図書館調査及び立法考査局編. 新編靖国神社問題資料集 [R]. 東京：国立国会図書館，2007：322.
[13]〔日〕村上重良著. 国家神道 [M]. 東京：岩波新書，1970：12.

（责任编辑 李彦学）

On the Evolution of Shinto in the Post-World War II Era (1945-2015)

Zhao Gang

Abstract: As part of a study on the change in Japanese religious belief after WWII, this paper intends to analyze the historical role of Shinto in post-war Japanese religious and social development, its influence and the change in itself since it was removed from the national worship shrine after the War. To achieve this end, the paper takes the state Shinto, the Yasukuni Shrine, and the sect Shinto as subjects, focusing on the separate changes of the three subjects, the current state of Shinto, and its actual influence to see the effect Shinto has on the selection of state system, the re-orientation of values, and the formation of the historical views of the right wings after the separation of state and religion under the guidance of GHQ. The paper also studies the influence of sect Shinto on traditional Japanese culture and the influence of Shinto religion on Japanese behavior consciousness and religious belief.

Key words: State Shinto, State system, The Yasukuni Shrine, Sect Shinto, New-emerging religions